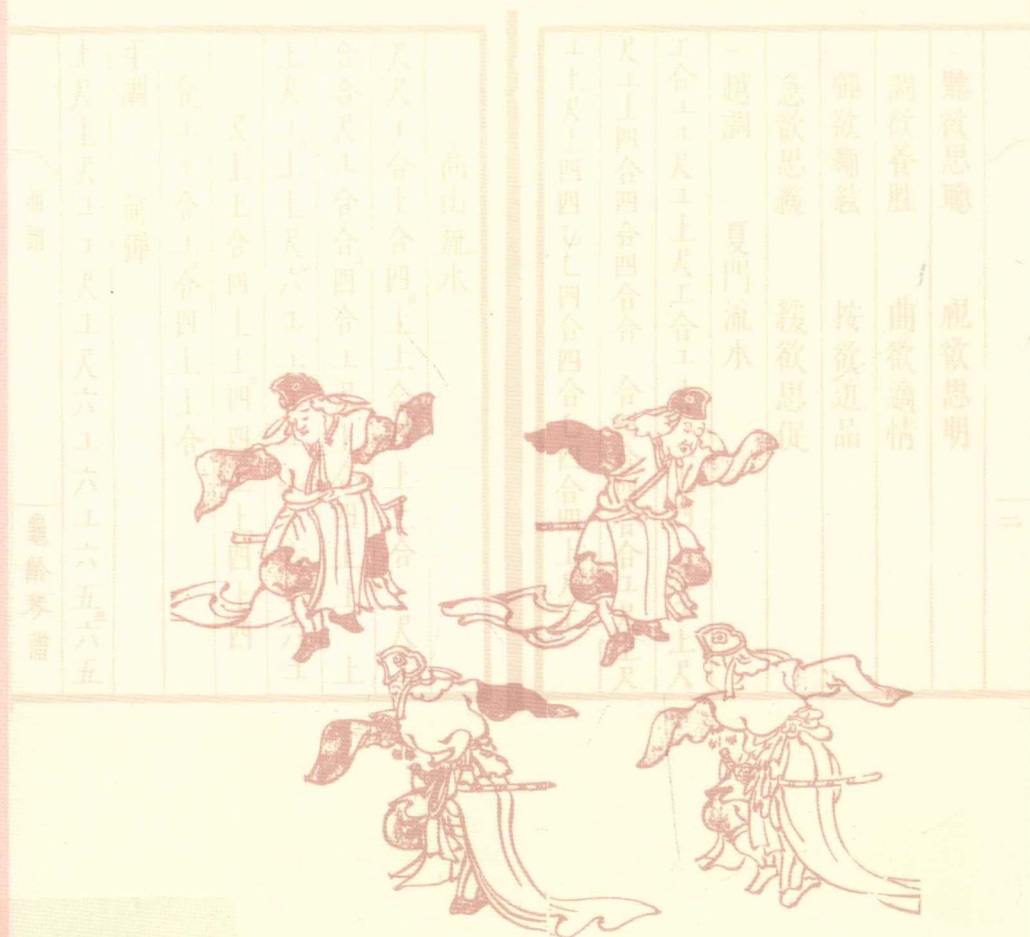


中国音乐 文献学初阶

王小盾
著
名师大讲堂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音乐 文献学初阶

王小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 王小盾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
(名师大讲堂)

ISBN 978-7-301-16210-1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音乐史—中国—古代 IV. ①J6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696 号

书

名: 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著作责任者: 王小盾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210-1/I·21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268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名 师
大 讲 堂

目 录

第一讲	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1
第二讲	学会阅读：以《礼记·乐记》为例	33
第三讲	掌握文史研究方法的三条途径	61
第四讲	古典文献学的构成	91
第五讲	利用工具书搜集专题资料	133
第六讲	域外汉文献中的音乐史料：越南和韩国	179
第七讲	域外汉文献中的音乐史料：日本	219
附录一	古典文献学参考书解题	257
附录二	音乐典籍在大型丛书中的分布	273
附录三	类书中的音乐资料	307
附录四	日本、韩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	335
后记		368

第一讲

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一、引言

《玉篇·系部》释“经”：
“常也，经纬以成缙帛
也，法也，义也。”

我曾多次向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课程，本讲是这几次演讲的讲稿。我也在其他学校向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作过相关演讲，在这样的活动中，对讲稿有所充实。现在，每当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我也喜欢向他们讲解大致相同的内容。之所以反复说这一番“老话”，是因为我觉得老话有“经常”的意义，涉及某种普遍性——各位是不是知道：按照《玉篇》的解释，“经”的含义就是“常”，因为布帛是通过经纬相交而织成的，所以“经”“常”代表法度和大义。其次，这些话是讲自己的经验，向听众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门知识，不如说是获得知识的方法，因而有其价值。这也就是老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另外，从内容上看，这里讲的是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候的经验，其实也就是讲 1980 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种传统。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我们“与时俱进”到 21 世纪以后，我们也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过头来学习传统的方式——进行总结。总之，今天我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也许有独特性，也许又有片面性，供大家批评、参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二、个人经历

在和音乐学界朋友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朋友所取得的

成就不一定和课堂学习有关。其实我也是这样，是一个对课堂比较陌生的人。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不听课了。有一次我逞能，上课的时候不听讲，而去猜测作业题；下课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说“今天家庭作业是第一题、第三题”等等，我就把写好的作业提前交给老师。没想到老师很宽容，对我并不指责；我想，大概因为她知道我毕竟学会了。这样一来，我就养成了不听课的习惯。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的算术总评分是一百分。当然，分数高并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警惕。一般来说，阅读是比较主动的学习，必须由自己来承担责任。在同老师胡闹的时候，我总是不敢大意，养成了仔细检查的习惯。这样一来，我的学习成绩就比较好。

阅读是比较主动的学习。

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下乡了。实在没有书看，就找高中课本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顺利地考进了大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能进大学就行。在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是一个办在茅棚里的学校；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填的是“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是代表某种理想的学校和专业。但我当时太幸运了，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在这一届，在这所学校，只有我是按第一志愿录取的，也只有我是语文、数学、外语都达标的（是从外语系录取后转入中文系的），老师们于是对我很照顾，鼓励我提前报考研究生，并且给了我一个便利条件——上课可以不听讲，坐在最后一排看书。

1979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复旦是名校，又正好碰到刚打开国门的年月，于是有很多海内外著名学者来讲学。我问王运熙老师要不要去听？他说：与其花一个小时

与其花一个小时听演讲，不如用十几分钟时间去阅读演讲者的著作。

听这位学者演讲，不如用十几分钟时间去阅读他的著作；而用上一个小时，你就可以看一整卷《史记》了。不去听讲，时间上更经济。因此，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没有

怎么进课堂，而是在图书馆泡了三年。

到了博士生阶段仍然如此。我的导师名任讷，字中敏，第一个笔名叫任二北，第二个笔名叫任半塘。其他别名、笔名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两个笔名却比较特殊，反映了他在两个不同阶段的学术理想。他起初喜欢北宋词和元代北曲，因此自称“二北”。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为了出版一部关于唐代戏剧的书稿，就用了“半塘”的笔名。“塘”字去掉“土”旁，就是唐代的“唐”字，“半塘”的意思是说他研究唐代文艺，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等。任先生当时给我订了两条纪律：第一，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其他时间都不休息。任先生说：“我已经八十八岁了，能不能活到九十岁，还很难说；你要抓紧。”但他长寿，到九十五岁才作古。这样一来，我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又在扬州陪了任先生将近一年。第二，这个学校的人，你一个都不要认识。他这样要求，是怕我的学习受干扰。这个不认识人的要求，我基本上做到了，因为我的社交活动仅限于每天打一场篮球，而打球的时候，我和球友只以外号相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没有办法接近课堂。

音乐文献学是“目治”的学问。

总之，我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课堂以外的。这次讲座，我的想法也是：借助中国音乐学院这个课堂，讲

一些超越课堂的话。因为所谓音乐文献学，就是超越课堂的学问——是“目治”的学问，而不是“耳治”的学问。研究音乐的人，习惯于耳治，所以，有必要作一个根本的修改。

1994年，我应《古典文学知识》的邀请，写过一篇《我的学术

经历》，其中有以下一段话，现在念给大家听一听，因为从中可以概括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凡括标阿拉伯数字的地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979年，我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提前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1）。从此以后，由王运熙老师引导走上了学术道路。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按导师要求，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2）（3）。我很崇拜王老师，对他的只言片语铭记不忘。于是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加强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也懂得了客观而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的重要性（4）。这时我也读了许多学术名著，例如清代学者的考据学著作、近代几位史学大师的论文集，以及王师所著的《六朝乐府民歌》、《乐府诗论丛》等，这使我注意到传统文学研究之外的一些学术领域，对王师习惯使用的“读书得间”的方法（5），或者说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所领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6），即曾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

1982年，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又师从任中敏先生，成为扬州师范学院隋唐燕乐歌辞方向的博士生（7）。这三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因为任师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换了一个专业，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三年的读书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想象。那时总是凌晨五时起床，往任师处报到，然后紧张工作到

天道酬勤



1985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和任半塘先生合影。

深夜；一年里只有春节那一天可以休息。当然，天道是酬勤的。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从技能培养的角度看，任师注重博大的学术作风迥异于王师注重精审的作风，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互补（8）。我按照任师的指导及其工作习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前编辑了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

《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借此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资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9）；同时也按照王师的习惯和方法，注重运用目录学的成果，注重专书研究，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清商曲与相和歌的关系、琴曲发展与《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关系、《乐府诗集》的史料来源等问题。总之，幸赖两位好老师的指导，当六年研究生生活结束之时，我毕生的学术事业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三、十条经验

现在，我就从那些括标阿拉伯数字的文句中，提出十条经验加以介绍：

（一）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

我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种迅速把握知识世界的冲动。好像只有对世界进行比较简单的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获得某种自信，内心才会平衡。所以，在1977年、1978年，我把朱光潜、宗白华两先生翻译的书、编写的书，比如《西方美学史》、《美学》、《判断力批判》，都读了一遍；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学美学。

但命运有时候是很照顾人的。报考的那年，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招美学研究生，相近的专业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我糊里糊涂就选了复旦大学。现在看来，这个糊涂之选，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相似，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在实际上，它们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专业——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专业的区别常常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区别？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是从中国文学史等本土学术中产生的专业，倾向于从中国文学的实际运动出发来观察理论现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论专业却不大相同，它是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倾向于依靠某种认识框架，直接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从方法角度看专业。

关于以上这一区别的来源，说起来话很长。简单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论却不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下，北京办起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讲习班。中国古代文论这个专业，就是由这个班的

学员们在后来创建的。其基本路线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的资料。如果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两个专业，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重视归纳的专业，讲究从事实出发来取得理论认识；古代文论是重视演绎的专业，讲究用某种理论框架——比如内容与形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模式——来解释事实。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术命题，一叫“论从史出”，二叫“以论带史”。两个专业的区别也正好对应于这两个命题的区别。那时尽管也有人讲“实事求是”，搞“论从史出”，但“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以论带史”却是一个更加时髦的潮流。

有一句老话：“郎怕选错行。”我很庆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进入“以论带史”的专业，而走上了一条比较务实的学术道路。为此，我愿意把我的宝贵经验推荐给大家，这经验就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我的意思是：现在学术界学科林立，但“学科”不等于“科学”。若要对这两者加以判别，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学科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经验事实。换一句话说，要看它的方法论：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马克思本人就表述过这个意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现在学术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永远都有从原则出发的人，永远都有人喜欢造海市蜃楼。为什么呢？因为海市蜃楼不光美丽，而且制造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制造海市蜃楼的工作很容易诱惑青年人。怎样破除这种诱惑呢？我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注意一下两个浅近的事实。第一是注意自己的经验。我们认识事物，是

不是从事实开始的？让我们放心的那些认识，是不是和经验相契合的认识？做学问同样如此。那种轻易产生的认识，绝不会是真理。第二是注意学术史。20 世纪学术史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用科学的认识、经分析得来的认识、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代替了笼统的认识——例如古典哲学的认识。学术史的这一成绩巩固下来了；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也只有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才能巩固下来。20 世纪 80 年代，在文学研究界出现过一种新方法的思潮，也就是主张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这一思潮是有意义的，但它不像 50 年代“以论带史”的思潮那样幸运，没有得到政治的支持，于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从积极方面看，它被各种传统的方法消化了；从消极方面看，它变形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的认识才能接近真理，而这种认识也才有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

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

（二）读原著

在研究生阶段，按照王运熙老师的要求，我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读原著的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我还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和道理。我们的必修课有四门：一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思想史，三是中国历史学，四是文

把现代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

献学。这些课程都是围绕原著展开的。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仔细阅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仔细阅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仔细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仔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这样做，就把现代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了。

《四库全书总目》的
意义是指导读原著。

在以上四门课中，最基础的应当是文献学，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材料学。所以王老师多次强调了读《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性。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就是可以指导读原著。读原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有决定意义，它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素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研究生阶段一旦结束，那种纯粹的读书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读书，好好读几部原著。这是治理国学最重要的事情。学习中国音乐史，也应该好好读几部经典古籍。

第一份练习题

如果围绕读原著来进行课程考试，那么考试的方式会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比如我后来给研究生上《史记》课，考试中就有这样一项：找一段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看你能不能理解；或者反过来，提供一段白话文，让你复原为《史记》原文。李方元、孙晓晖他们都上过这门课，成绩不错，基本上都达到80分。在中国音乐学院能不能按这种方式上课呢？从条件上看是可以的。上午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看了一下，一楼阅览室有《四库全书总目》，总书库有两万多册线装书，电脑目录中可以检索到几千种新印本古籍，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印古籍和关于古籍的书有5280册。同国内其他艺术院校相比，水平是比较高的。为此，今天我想留给大家一个作业：利用现有条件去翻看

一下中国古籍，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作一个粗浅的了解，了解它们的基本内容，也了解它们的主要版本。如果不这样做，就学不了文献学。

（三）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关于学术能力的三句话

学术能力是什么？是逻辑能力还是记诵能力？有的人认为是记诵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背诵原典——有的背诵《史记》，有的背诵《说文解字》，有的背诵《资治通鉴》，有的背诵《十三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符合远古时代训练巫师的传统，古代人一直是这样学习的。另外有人认为是分析能力，所以强调思维训练。现代学者喜欢这样做。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历史文献不多的情况下，需要思考和想象。不过在我看来，进行国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却应该是三句话的综合，即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工作就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学术工作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以上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要熟悉图书馆，了解资料的有无，以及资料的分布。要读懂材料，就要有尊重古书的态度，同时有读古书的丰富经验，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起码认识繁体字。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析材料。

正如上面说到的那样，现代人喜欢片面地讲分析材料——只讲分析材料而不讲其他。这样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这种习惯，在我看来就像造海市蜃楼的习惯一样，出发点

只讲分析材料，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